

立建書局文庫 新印本

著 漁 友 張

572.1.8

57
30
2

輯四第書叢報快期星



3 0647 4893 6

如何建立新日本

張友漁著

一、摧毁舊日本，建立新日本！

東方的法西斯侵略者——日本，終於追隨西方的法西斯侵略者——德國之後，在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壓迫之下，宣佈無條件投降了。這是反法西斯戰爭的一大勝利；是反法西斯運動的一大成功。然而這還不能說是最後的勝利，最後的成功。如果不能從根底上，把舊的日本澈底摧毁，而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日本，則它仍有再度成爲法西斯侵略者而威脅和破壞世界和平特別是遠東和平的可能。

我們知道，舊日本是一個大獨佔資本家，大封建地主共同支配下的，半軍事的，半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政權是一個半軍事的，半封建的法西斯政權。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權，是必然要對外侵略的。無疑地，日本軍閥是侵略戰爭的直接發動者和堅決執行者。但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爲什麼能這樣做？決不是單單由於他們抱着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的野心，而是舊日本這樣的國家，這樣的政權，給予了他們以可能乃至必須這樣做的客觀的基礎。因此，不從根底上，澈底摧毀舊日本，建立新日本，則在戰爭上，一時擊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迫使它無條件投降，並不就能保證它不再威脅和破壞世界和平特別是遠東和平。

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無條件投降，僅不過是舊日本開始被摧毀，而不是它已經被摧毀。實際上，舊日本統治階級正在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力謀保衛他們的舊日本。我們不要被勝利衝昏頭腦，



認為現在已可高枕無憂了。恰相反，今天，我們的面前還擺着沒有解決的非常重大的問題，那就是怎樣澈底摧毀舊日本，重新建立新日本。

所謂摧毀舊日本，建立新日本，具體地說，就是：摧毀侵略的日本，建立和平的日本；摧毀法西斯日本，建立民主日本。這任務，一方面，要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擔負；另一方面，也需由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來擔負。在今天說來，因為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沒有等到日本人民自己起來摧倒法西斯統治者，而已先獲得擊敗日本的勝利，握着控制日本的權力，所以對於這一任務，事實上，是首先擔負起來了。

一一、盟國應該怎樣處置日本？

摧毀舊日本，建立新日本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目前首先要擔負起來的任務。為了完成這任務，必須在處置日本這件事上，採取適當的辦法。

什麼是適當的辦法呢？這本來要看對日戰爭是在怎樣的情況之下結束而定。由於戰爭結束的情況不同，而處置日本的辦法也就隨着有所不同。對日戰爭原可能在四種不同的情況下結束。第一種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最希望，而且曾經不斷努力爭取的所謂「平等的和平」。就是它在軍事已經沒有勝利的把握的時候，轉過頭來，採取政治攻勢，誘惑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它和平妥協。倘使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上它的當，則它便可贏得時間，徐圖再起。如果對日戰爭在這樣的情況下結束，則除却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放棄一部或全部侵略成果以外，更無所謂處置日本問題了。幸而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沒有上它的當，堅持着無條件投降的原則，事實上，粉碎了它的這種企圖。

和這種情況相反，爲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最不願其實現的情況就是不等到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軍隊攻到日本本土，而日本人民大衆便已自己起來，推倒法西斯統治，肅清法西斯毒菌，樹立起徹底鎮壓法西斯分子的人民的民主政權。這樣一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便不僅在對外戰爭上失敗，而且在對內統治上也失敗；不僅沒有力量繼續戰爭，而且也沒有資格談判和平。從此，便將在日本政治上、至社會上，根本被消滅。因而所謂日本，在本質上，已起了變化。反法西斯同盟國家處置這樣的日本，不是以法西斯政權爲對手，而是以人民政權爲對手。問題自然變得很簡單了。

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只是不容許一個法西斯的，侵略的日本存在，並不是要滅亡日本這個國家，也不是要分割日本的領土，甚至也不是要干涉日本的內政。只要日本人民大衆自己能够起而革命，推倒法西斯統治，樹立人民的民主政權。則反法西斯同盟國家自願和這樣一個自由獨立的民主日本和平相處，決不會企圖以武力控制日本，鎮壓日本，摧毀日本的工業，分割日本的領土，奴役日本的人民。自然，這樣的人民的民主政權是必須澈底解放日本所會統治的殖民地，完全放棄日本所會掠奪的他國領土，以及根本肅清日本國內的法西斯毒菌的。如果號稱革命的人民的民主政權而仍不肯這樣做，則它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的人民的民主政權，而是一個人民的民主政權的贗鼎，法西斯政權的化身。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於它的處置也就不能客氣了。不幸，由於日本人民力量的發展還沒有成熟，還不够強大，遂致這種情況也未實現。

在上面二種情況之外，第三種情況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軍事力量，在戰爭中，被澈底擊潰，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軍隊踏入了日本的本土。這時候，日本人民大衆的力量，還沒有成熟到足以樹立人民的民主政權的程度。如果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不採取對付德國的辦法，而採取對付意大

利的辦法，而在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控制下成立一個過渡政府，則這政府將是像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奧政府那樣依然包含着法西斯成分，甚至可以說只是法西斯勢力的一支派的政權；或是以所謂「日本的自由派」為中心的，甚或只是該派清一色的大資產階級的政權。對於這樣的政權，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是不應該給予絕對信賴的。在這裏，就不能不發生怎樣處置日本的問題。這情況，由於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戰爭中途，便「無條件投降」，也沒有完全實現。

此外，還有第四種情況，就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等到軍事力量澈底被擊潰，而在戰爭的中途，「無條件投降」。這時候，日本的政權或是仍握在法西斯軍閥手裏，或是嬗遞給巴多格里奧式的政府或所謂「日本的自由派」的政府。對於前者，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當然不應該容許它繼續存在。縱然以它為談判的對手，而對它的本身，則必須予以摧毀或改造。對於後者，如前所述，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也是不應該給予絕對信賴的。在這裏，自然也要發生如何處置日本的問題。今天所實現的就是這種情況，鈴木內閣換成了東久邇內閣，實質上，毫沒有什麼變更，政權依然握在法西斯軍閥和大獨占資本家手裏。

正因為所謂處置日本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生的，不是和法西斯侵略者站在平等地位談判詳盡的討論，但沒有能够獲得完全一致的意見。這正表示在各國家，各階層間，對於這一問題，也不是以真正的，革命的人民政權為談判對象，所以問題就複雜化，而各方的意見也就不易一致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間，在美國佛吉尼亞州溫泉舉行的太平洋會議對於戰後處置日本問題，曾作詳盡的討論，但沒有能够獲得完全一致的意見。這正表示在各國家，各階層間，對於這一問題，存在着各種不同的主張。這些主張，大體上，可以類別為下述幾種：第一種是由於過去遭受日本

法西斯侵略者不斷挑起侵略戰爭，擾亂世界和平的毒害，而特別着重解日本的武裝一事，像美國的孤立派參議員范登堡也會提議：「各主要同盟國家應立刻談判締結條約，藉以永久解除德日武裝」。這一提議博得了美國多數人民的喝采。據蓋格普民意測驗所測驗的結果，美國人民中，有百分之九十二，原則上，贊同范登堡的提議。格魯雖反對在經濟上，過分壓迫戰後的日本，但他主張，「在戰後處置日本的主要基本目標，應該是永遠剷除日本的軍閥毒瘤」，也就是「必須用武力解決日本的海陸空軍，使它沒有力再從事作戰」。Hugh Byas 氏則謂：「解除軍備是我們和平條款首要的一條，當日本的陸海空軍全被擊敗以後，軍備自然即行解除。日本的兵工廠將被毀滅，並由同盟國家派員控制和監視」。解法西斯侵略者的武裝是必須採取的處置。除非是以真正的人民的民主政權為談判和平的對手，則必須完全和永久解除日本的武裝，一直到真正的人民的民主政權樹立為止。

第二種是在解除武裝以外，更進而主張限制日本經濟的發展。他們的理由是「要真正做到澈底解除日本的武裝，就必須限制它的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不受限制，則日本的武裝雖被暫時解除，而其恢復是非常容易的」。例如他們說：「現代生產，軍備非軍備，事實上，難以區別。生產力發達的國家，即使解除武裝，也隨時可以重整軍備」。因此，他們主張：「我們與日本帝國主義戰爭不是要求日本取消天皇制或取消利用天皇制的軍部，而是要消滅日本向外侵略的生產組織」。換句話說：「戰敗的日本要閹割去重工業，澈底地，解除侵略的武裝」。又如他們主張「築一道圍牆把日本圍起來，——聽其自作自受地生存」。他們以為「日本在它躍起成為列強之一的過程中，利用出口貿易上的競爭和軍事上的侵畧兩種手段，使它變成世界關係上的一個防害

據他們的意見，「爲了制止日本在未來企圖重建武裝起見，控制日本的進口貿易實爲有效的辦法」。美議員楚德就曾明白地主張：「吾人必須限制日本的入口貨物，以阻其重整軍備。」這些主張未免失之過苛。在日本人民的民主政權沒有樹立起來的情況下，有了解除日本的武裝而毀滅它的軍需工業，相當管制它的一般重工業，固然是必要的，但完全而且永久破壞日本的一切重工業，封鎖日本的對外貿易，甚至控制日本的整個經濟，而阻礙它的發展，則不僅是不合理，而且是有害的。誠如格魯所指出，「這將造成日本人民的憤恨，而隨時暴發爲反抗」。他主張：「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應有權決定日本爲維持本身和平的經濟所必需的工廠和機器，並在同盟國家認爲適當的處置多餘的部分，應拆除兵工廠，造船塢，並取締爲製造軍火而設的一些重工業。」格魯是一個親日派。他的處置日本的主張大抵是有利於日本統治階級的，因而也是有害的。但這一主張却可以採用。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太平洋學會的會議中，據說：「西方國家代表團主張對日本，加以強有力的經濟限制，藉以永久消滅日本征服他國的野心，而東方國家代表團則願使日本維持適當程度的工業化，便對全亞洲未來發展有所協助」（一月十二日，佛吉尼亞州溫泉合衆電）東方國家代表團身受日本侵畧的威脅，並不會有意培植一個能够再度實行對外侵畧的強大的日本。他們所以不同意給予日本以強有力的經濟限制，無疑地，是認爲這是無益而有害的措施，它會造成民族間的仇恨，埋藏下爆發再一次戰爭的禍根。實際上，像岡野進所說：「本來，是否進行戰爭並不決定於工業的有或無。戰爭不是機器發動的，而是人造成的。換句話說，政治產生戰爭，所以讓那些對侵畧戰爭毫無利益的日本人來實行政治，管理工業，和平工業是發達了，但絕對不會製造侵畧用的武器。簡單說，從政治上，解除武裝，是保證和平最確實的辦法。那末，

最反對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是什麼人呢？不是大資本家，而是勤勞人民大眾。勤勞人民大眾的政治，即澈底的民主主義政治的實現，才是防止侵畧戰爭重新發生的最好的辦法。如果這種民主政治得到保證，日本工業的有無也就不成問題了」。「日本產業，技術的進步遠在東方各國之上。因此，對戰後東方各國的工業化，可以作不少的貢獻。人工地阻止日本的工業的發達，或消滅整個工業，對於東方民族有什麼利益？把日本拖回到半世紀前的農業國家，對於世界進步有什麼利益？結局是矯枉過正。這難道不是世界文明的損失嗎？」。

第三種是主張不僅在澈底擊潰日本後，而且就是在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為了達到真正解除日本的武裝等目的，必須派軍隊佔領日本的領土乃至分割日本的領土。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日戰爭的目標，很明顯，是爲了反對法西斯，反對侵畧。並不是爲了消滅日本這個國家。佔領日本的本士只盡爲了在軍事上、澈底擊潰日本法西斯侵畧者和在政治上，根本肅清法西斯主義的殘滓，而不能不採取的一種手段。這種佔領是無可非議的。日本的革命領袖岡野進在接見紐約太晤士報記者時，也曾表示：「他們希望日本人民能先起來打倒軍閥，使同盟國家的軍隊佔領成爲不必要，但日本人民如因沒有援助不能完成其任務，則他們贊成同盟國家的軍隊佔領日本」。不過，就是這種佔領也是在上述軍事的或政治的任務完成之後便應該撤退。至於沒有必要而佔領日本的領土，那是必須避免的。*George F. Kennan* 氏說：「有人主張用武力佔領日本。作者以爲這個問題，只能看軍事上是否必要來決定。如果對於完全勝利是必要的，自不惜大規模攻入日本；如果只是爲我們的既得勝利的一種示威表示、那我們就要問一問這種佔領究竟有什麼意義？」「使日本人在戰敗的大辱上，再加上一些瑣碎的侮辱，像上次大戰以後，佔領萊因河流域那樣，似沒有什麼意義」。

。——但有一種佔領具有實際的價值。我們可以佔領日本的海軍軍港和兵工廠，結束空軍已經開始的工作。這是解救敵人武裝的處置，合乎我們戰後的政策。海軍軍港和兵工廠變成廢墟以後，我們就撤退我們的武力。這種戰爭行為不致予敵人以不必要的侮辱，也不致留下慘痛的回味」。他又說：「我們佔領日本的目的只是要確保實行停戰條款」。——讓我們長期佔領日本的領土，保證每一個日本兵都被召回國，解除武裝，復員，每一架飛機，每一門大砲，每一輛坦克車，都被毀掉，每一艘戰艦都被擊沉，那時候，我們就能夠退出來了」。H. S. Truman 的基本立場是保守的。他在處置日本問題上，持着不少的錯誤見解，但強調在沒有必要時，不必佔領日本領土，而在既佔領後，也應該於任務完成後退出，這一點，却在原則上，是正確的。不過，他把所謂「必要」只限於軍事範圍，殊嫌不够。其實，在人民的民主政權沒有樹立起來的時候，爲了扶植人民的民主政權而鎮壓法西斯殘餘勢力，相當時期的軍事佔領也是必要的。

至於分割日本的領土，這在原則上，本來不是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戰爭目標。不過，所謂日本的領土當然不包括殖民地，委任統治地和作爲侵畧果實的佔領地——不問佔領的時期遠近。這些地方是必須從日本的手裏拿出來的。在開羅會議的宣言裏，曾經說：「日本由中國竊佔的一切土地，如東四省，台灣，澎湖羣島，應使其歸還中國」；「日本應從其由暴力或貪婪所強佔的一切區域內被驅逐」；「中英美三大強國念及高麗人民久受日本虐待，決在相當時機，協助高麗自由獨立」。這是極合理的主張。在擊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後，必須首先實行，不僅這樣，如果戰後的日本，還不是人民的民主政權支配下的日本，則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對日施行「檢疫」，也是必要的。他說：「吾人不能信任日本的諾言和榮譽。因此，吾人在未來期間，須在比較接近日本的

地方，經營前方基地系統」。這是要在日本的周圍，建築美國的防禦基地；另一方面，也是要剝奪日本作為侵略憑藉的基地。就是所謂「從地理位置上，解除日本的武裝」。但是，這事情在實行時，必須有分子人超過防禦侵略的範圍，而任意分割日本的領土，則是有害的。

前面第四種是認為日本民族根本是一個侵賊民族，必須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加以長時期統治，才能改造它的民族性，而消滅侵略的禍根。他們說：「一個以強暴侵略為道德標準的瘋狂民族，在國際間，決不能許其民族自決。因為他們的自決，便是侵略，便是戰爭，必然防礙世界和平」。因此，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於日本這一個瘋狂民族，必須加以「整個管理」就是「統治」，「愈管得徹底，愈是督療得容易」。或許二三十年之間，可以治好日本的瘋病。到那時候，日本民族方能與世界謀和平民族有共通的道德標準，才方可以有能力自決」。他們雖沒有公然主張從地圖上抹出日本這個國家，但即要把日本變為所謂委任統治地，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代管南洋委任統治地一樣，在這次大戰後，日本本身要被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代管。這在實際上，是把日本滅亡了。為了監督停戰條款的實現，為了鎮壓法西斯勢力的再起，為了扶助人民政權的樹立，及被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日本，在軍事上、政治上，舉行在一定範圍和一定時期之內的必要的管理，像對意大利乃至對德國那樣，自非不可。但是把日本從一個獨立的國家降為被人代管的委任統治地，則絕對不可。這不僅違反反法西斯同盟國家對日作戰的目標，而且也必會引起整個日本民族的反抗。

前面主張長時期統治日本的人們所根據的主要理由就是日本民族根本是一個侵賊民族。其實，這種根據是莫非薄弱的。所謂民族性原是社會條件所造成的，決不是固定不變的東西。沒有那一個

民族的民族性永久是侵略的也沒有那一個侵略國家的人民完全是贊成侵略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對外侵略，決不是什麼整個民族性的表現，而只不過是法西斯軍閥和站在他們背後的大財閥，大地主的貪婪，殘酷的暴行的表演。把他們和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大眾認為是不可分離的一個整體；把他們的侵略暴行認為是代表全體人民大眾的意思和利益並獲得全體人民大眾的支持和擁護；因而認為不僅他們應該受嚴重的懲罰，而且在他們統治下的全體人民大眾也應該同樣受嚴重的懲罰，實在是不正確的見解。須知任何法西斯侵略國家的統治者都是和在他們統治下的人民大眾，根本上，站在敵對的地位。他們對外是侵略別的國家，而對內則是壓迫自己的人民大眾，雖然他們運用各種的欺騙方法也常博得一部份落後的人民的支持，雖然他們採取殘酷的強制手段，也曾驅使一部份怯懦的人民替他們服役，但這些欺騙和強制是不可能長期間有效的，特別是人民大眾中間的前進份子，決不會受他們的欺騙，也決不甘為他們所強制，在意大利是這樣，在德國是這樣，在日本也是這樣。日本人民大眾是具有着反戰，反法西斯的光榮歷史的，特別在日本投降的前夕反戰，厭戰的運動更是在日本國內和佔領區，在日本人民和軍隊中，都迅速而普遍地開展着。誰能說日本大眾是和法西斯軍閥同樣主張實行侵略戰爭，并支持和擁護這種戰爭因而應該受嚴重的懲罰呢？自然，日本人民既不能於事先制止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暴行，又不能於事後推反法西斯政權而結束戰爭，致被侵略的國家遭受重大的損失，有如主人不能發米自己豢養的瘋狗，讓它咬傷路上的行人一樣，是不能不負賠償責任的。根據這個理由，給予相當懲罰，例如由於賠償被侵略各國的戰爭損失，而担负物質上的重荷等，自無不可，但使日本從獨立國家降到委任統治地，使地日本人民長期受別的國家的統治，則有類於「驥田奪牛」未免失之過苛了。

第五種是反對第四種主張而走入了另一偏向。就是他們主張絕對不干涉日本內政，因而對於日本的反動政權不必推翻，對於日本的人民政權不必扶植，一切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去解決就是了。（H. D. Byas）的主張可算是它的一個典型的代表，他認為：對於戰後日本，「如果要求一個人民的政府，那就是要求一個平民的政府，那就要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德國幹出的錯誤。」因此，他主張：「處置戰敗後的日本的原則，是不干涉日本的內政。無須分別日本的各色份子。合理的途徑是要使日本全國國民對他們所擁戴的政府負責。不要指出任何一類日本人是我們所贊同的，因為這樣一來，我們就容易墮入日本軍閥的彀中。」我們只能和依法成立的政府交涉。如果政府是陸海軍將領組成的，那就更好，因為這樣，責任會更分明。」不錯，「干涉戰敗國家的內政」是應該遵守的原則。但這並不妨礙摧毀法西斯政權，鎮壓法西斯份子，援助民主勢力，扶植人民政權。因為這樣做，不僅是實現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作戰目標和保障它們的戰勝成果的必要步驟，而且也是適合日本人民大眾的要求，和他們的利害相一致的。不錯，日本人民有自己選擇和決定其政府的形式的自由權利，但他們所樹立的政權，本質上，必須是民主的，而不是政府的實質，我們相信日本人民大眾所願樹立的政府必然是民主的政府；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今天，如果反法西斯同盟國家不援助日本人民大眾來樹立這種政府，則反動份子違反人民大眾的意思而維持着一個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政府，並非決不可能。因此，把不干涉內政的原則解釋為縱容法西斯政權存在，把讓戰敗國人民自己選擇和決定其政府的形式的原則解釋為縱容他們中間的一部反動份子樹立法西斯政權，那是不正確的。西班牙內戰時代，不是也有人揭露着。

「干涉政策」嗎？結果是幫助了以佛郎哥爲首的法西斯叛徒，而絞殺了共和政府。這覆轍是再蹈不得的。Wilson 氏說得很對：要使日本不復成爲世界和平的威脅，必須組成一個民主政府，對全國人民負責。所以我們對於日本人民中的反軍閥的民主運動必須予以儘量的援助」。如果說，這是干涉日本內政，那麼，我們敢說，這種干涉是必要的。

上面所述的各種主張，像我們所批評，大都是不完全正確的主張。我們以爲雖然對日戰爭和對德戰爭是在不同的情況下結束，因而處置日本的辦法和處置德國的辦法，在具體措施上，也就不應完全一致，但是，在原則上處置德國的辦法是應該適用於日本的。因此，公天處置日本，首先要必須是：（一）徹底解除它的武裝，摧毀它的軍事機構；（二）毀滅它的軍需工業，相當管制它的工業；（三）嚴懲戰爭罪犯，清滅驕武思想；（四）剝奪它的殖民地，佔領地，并在一定期間內，佔領它的本土；（五）追究賠償責任，課以實物負擔；（六）特別重要的是鎮壓法西斯勢力，扶植民主政本，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中英美三國宣布的波茨坦對日聯合宣言，原則上，包涵着我們的這些主張。我們大體上，擁護這宣言。現在我們所希望於反法西斯同盟國家的，只是在其體事實上。貫澈這宣言，所包含的原則。

二、徹底實現波茨坦宣言的原則

波茨坦聯合宣言向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提出下述無條件投降的條款：（一）「欺騙和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想征服世界的東西的權威和勢力必須永久剷除，因爲我們堅持非將負責的第兵團武主義逐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和正義的新秩序勢不會產生」；（二）一直到這秩序成立時，以及

直到日本製造戰爭的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的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的指定，必須佔領，使我們在這裏所述的目的得以完成；（二）「開羅宣言的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的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和我們所指定的小島之內」；（四）「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返其故鄉，將有和平及生產生活的機會」；（五）「我們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我們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的制裁」；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生趨勢的復興和增強的所有障礙予以消滅；言論，宗教和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的重視必須成立」；（六）「日本將被允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和可以償付貨物賠款的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的工業不在內；為了這種目的可允許其獲得原料，以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當可被允許」；（七）「上述目的達到及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志，成立一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八）「我們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并對這種行動的有意實行，予以適當的各項保證」；「除這一條路，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這些條款的內容和我們的主張，在原則上是一致的。我們贊同和擁護這個宣言。

我們所擁護的，當然是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所反對的，最初，它拒絕接受這宣言。七月二十七日，鈴木內閣舉行閣議後，經日本通訊社發表對這宣言的輕蔑答覆說：「日本將遵照既定政策進行大東亞戰爭到底，鈴木貫太郎本人也於二十八日，公開向新聞記者表示：『日政府繼續作戰的決心』。到八月九日，蘇聯參戰後，它才被迫宣布準備接受波茨坦聯合宣言，就是說準備無條件投降，因為那時候，它已知道無條件投降是它必然遭遇的命運。不是無條件投降，便是徹底被毀滅。爲了避免徹底被毀滅，它是不能不被迫選擇無條件投降這一條路的。但是它并不是具有無

條件投降的誠意。它只是企圖在無條件投降的名義下，保存它在軍事上，經濟上的力量和利益，特別是在政治上的法西斯統治，也就是說，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抽象原則，而造成有條件妥協的具體事實，誠如岡野進所說：「日本『穩健派』軍國主義企圖以提早投降取得同盟國方面的寬大處置，以便保存和隱藏自己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祕密準備將來的復仇戰爭。」英工黨機關報每日前鋒報也指出：「日皇，鈴木以及他們的廣播員都認為投降是一種策略，且正在計劃另一個戰爭」。

正因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企圖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抽象原則，而造成有條件投降的具體事實，以便保存和隱藏自己的力量，而準備將來的復仇戰爭，所以它在宣布準備接受波茨坦聯合宣言時，特別附以「一項諒解」，說：「上述宣言並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損『天皇陛下』作為至高統治者的皇權」，而希望這「諒解能獲保證」。這所謂「諒解」，實際上就是條件。假使同盟國家「保證」了這個「諒解」，那在實際上，就無異承認了保存作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的「天皇制」那樣的條件。幸而同盟國家沒有完全滿足它的「希望」給予它的所謂「諒解」，以充分的「保證」。美國務卿貝爾納斯代表同盟國家給予它的答覆是：「日本『天皇』和日本政府統治國家的權力須服從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就是說，所謂「皇權」並不能對抗盟國最高統帥的命令，因而握有這「皇權」的所謂「天皇陛下」自也不能算做什麼至高統治者了。但是，在對內關係上，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仍可把它解釋為「皇權高於一切」是被承認了。因為「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營簽字於必須的投降條款」，是要「天皇」「授權和保證」；「日本海陸空軍停止抵抗，交出武器」是要「天皇」「頒發命令」；而盟國最高統帥在實施投降條款時，所需要的其他命令」也是要「天皇」

「發布」：一切經由「天皇」；一切依靠「天皇」，離開「天皇」，盟國最高統帥是無權直接管制日本的。這樣，就在事實上，給予了它以在實行波茨坦聯合宣言所列舉的條款時，自由伸縮的餘地。

無可否認，在今天，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已不可能也不打算完全不實行波茨坦聯合宣言所列舉的無條件投降的條款，而只是企圖在這些條款的具體內容上和實行過程中，使它變質，至少，使它減弱不利於自己的程度，以便它準備將來的復仇的戰爭。它所以要求保存作為法西斯統治的基礎的「天皇制」，其作用就在這裏。八月十九日的蘇聯真理報曾經揭露它的這種企圖，真理報說：「日本統治集團企圖逃避自己罪行的責任，並同時企圖加強日本帝國主義的整個機構。無論誰，在日本的全部宣傳中，都找不出日本統治者對自己罪行的承認和他們所犯罪惡應負的責任。在過去，日本『天皇制』是用來號召征服，而現在，則是用來號召對精神上和政治上，被解除武裝，圖謀報復」。美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史溫也說：「日本政府仍然存在，而且是一個龐大的和活躍的機構。他們將接受盟國的命令。聽命的政府和發號施令的政府，其間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天皇』左右的人當然很明白。他們現在希望是當盟國的條款先後實行和駐在日本的盟軍撤退回去了時，『天皇』左右的近臣們又可把他們的現政府恢復過來，然後他們又重振旗鼓再建設一個大日本」。是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是抱着重整旗鼓的野心的。

波茨坦聯合宣言所列舉的條款，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在原則上，是接受了，但在具體內容上，它却要求同盟國家給予寬大的規定。例如關於佔領日本本土，它就要求只派少數陸軍作所謂象徵的登陸，而登陸的區域則「只限於軍事上或政治上的重要地點」（八月十九日東京日文廣播）。又如

關於解除日本武裝，它就要求保留龐大的非正規軍隊的武裝組織和堅強的軍事機構。此外，關於消滅驕武主義，關於拆毀軍需工業，關於懲辦戰爭罪犯等，它都要求有利於它的寬大措施。例如，日政府外務省發言人加瀨八月卅一日向外國記者發表日本投降的正式聲明，懇求美國的友誼和諒解時，便說：「戰爭罪犯問題極為複雜。日本急於竭盡力所能及，開闢久遠的友誼的途徑。戰爭罪犯問題乃我們所遭遇的最大問題。這問題並須賴你們解決。倘日本人民能信服被指為戰爭罪犯的任何人應受審訊，日本人民將不反對，我們預料將接受堅決處置，蓋我們深知自己乃被人征服者。但是盼望你們保持公平，我們盼望你們不虐待我們。你們若對待我們公平，我們二國將來的友誼可以確保」。日本麥西斯侵略者的這些要求，我們相信同盟國家是會堅決拒絕的。本來，波茨坦會議關於處置德國的決議，應該同樣適用於日本。例如關於占領日本本土，不僅應該派相當大量的軍隊，而且應該作相當時期的佔領（除非日本已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又如關於解除日本武裝，不僅應該解除正規軍隊的武裝，而且應該解除一切非正規軍隊的武裝，還有，關於懲辦戰爭罪犯，不僅應該嚴懲直接作戰的軍閥，地主和官僚；此外，一切實行於德國的嚴厲措施都應該適用於日本。日本的降伏文書雖表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繼承者承諾着實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條款」，但除却與戰爭行為直接有關的「無論怎樣地位的一切日本軍隊及日僑臣民即刻停止敵對行為」，以及「無論怎樣地位的一切日本軍隊和在日本支配下的切軍隊的指揮官，速即發布其本身或其支配下的一切軍隊無條件投降的命令」等規定外，沒有涉及其他問題。如果今後在處置日本的具體辦法的內容上，沒有像處置德國那樣的嚴厲的規定，則波茨坦聯合宣言的原則是可能貫徹的。

僅僅在處置日本的具體辦法的內容上，有不嚴厲的規定，還不够。必須使這些規定在實際上，澈底實現。這本來是要像管制德國那樣，由同盟國家在一定期間和一定範圍內，直接管制日本。可惜這一點，由於同盟國家的讓步已經做不到了。現在，一切投降條款，處置辦法，都須經過所謂「天皇」者，交給反動的日本政府去執行。可以想像在執行中，它一定是會玩弄種種花樣，以謀保存其軍事上，經濟上，政治上的實力的。譬如說到解除武裝罷，儘管在投降條款和處置辦法上，嚴厲地規定一切正規軍隊和非正規軍隊的武裝都須解除。但是如果同盟國家在它的執行上，不能認真地，加以嚴格的監督，則它必然會把大量武器分散和潛藏在還受着法西斯主義的影響的「民間」，甚至祕密保存着所謂「民間」的法西斯武裝組織。八月十二日，鎌木內閣的安倍內相竟宣稱要「加強國民義勇隊組織」。東久邇內閣上台後，雖把國民義勇隊取消了；但新內閣山崎巖又公然說要「大事增強警察」了。八月三十一日在鄉軍人會也宣布解散，但誰能担保他們不會有祕密組織呢？該會會長井上幾太郎不是還在號召會員們「恪守十年來的一貫精神，各就本身崗位，貢獻日本的重建工作」嗎？至於分散和潛藏武器，德國法西斯侵略者曾經這樣做過，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當然也會這樣做。又譬如說到相當管制重工業特別是拆毀軍需工業罷，儘管在投降條款和處置辦法上，嚴厲地規定一切可能直接間接，使日本重新武裝起來的工業，都須拆毀。但是如果同盟國家在它的執行上，不能認真地，加以嚴格的監督，則它必然會把重工業僞裝為輕工業，在和平工業中，埋藏着軍需工業的種子，把獨佔企業分散為小企業，把公有財產改變為私有財產，把國家資本移轉為私人資本。八月十七日白藏相津島說：「軍需工業轉變為和平工業，由國家保證」。東久邇內閣這樣的政權會保證軍需工業轉變為和平工業嗎？實際只是在和平工業中

埋藏軍需工業的種子罷了。其他一切條款，一切辦法，都是這樣。只要是不認真地，加以嚴格的監督，則實際上，不過是白紙上寫黑字的一串空話罷了。波茨坦聯合宣言規定：「上述目的達到了（指該宣言所列的各條款）及依據白奉人民自由表示的意見，成立一個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後，同盟國佔領軍隊當即撤退」。八月十一日，美國務卿貝爾納斯對於日本要求保留「天皇制」的新謂「譯解」的答覆，也宣稱：「同盟國的武裝部隊將留於日本，直到波茨坦宣言所規定的條款達到為止」。這是什麼意思呢？我想決不是為了鎮壓日本人民而是為了監督日本政府；決不是為了扶助日本政府鞏固法西斯統治，而是為了壓迫日本政府實行投降條款。如果同盟國家在投降條款的執行上，不能認真地，加以嚴格的監督，則派進軍隊佔領日本，便毫無意義了。

僅僅同盟國家認真地，加以嚴格的監督還不够。要保障一切投降條款，處置辦法能够澈底實現，則必須首先消滅日本假法西斯統治，樹立真正的民主政權。波茨坦聯合宣言所謂「依據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思成立一個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當就是指成立真正的民主政權。沒有真正的民主政權，則所謂解除日本武裝，拆毀日本軍需工業等，是不可能澈底實現的。八月十七日，替代被稱為戰爭內閣的鈴木內閣而上台的簽訂降約的東久邇內閣決不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政權。它的產生並不是基於人民的選舉，而是基於「天皇」的命令，因而它的人選也就都是一羣擁護「天皇制」的法西斯份子毫無民主氣息。拿它和鈴木內閣比較，不僅是一邱之貉，而且是變本加厲。岸野進曾經指出：

「十七日成立的新內閣的官僚們，不都是曾經準備或執行太平洋侵略戰爭的罪犯嗎？例如總理大臣兼陸軍大臣東久邇宮就是數月前的本土防衛司令，國務大臣近衛是準備太平洋戰爭的

罪魁，海軍大臣米內直到數月前，仍指揮海軍軍政，外務大臣重光葵直到今年四月，猶領導反英美的外交，軍需大臣中島是日本最大飛機製造者之一，其他，大部份大臣也都參加過戰爭內閣，只從這屆內閣的構成來看日本統治者的企圖何在，就洞若觀火了」。

這些傢伙不僅是準備或執行太平洋侵略戰爭的罪犯，而且更是實行侵略中國的禍首。他們所組成的內閣，無疑地，是只能爭取維持法西斯統治，而沒有任何誠意執行波茨坦聯合宣言的條款，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的。東久邇宮就職後的表示，一則曰：新政府的根本政策將為根據勅書，尊崇憲法並維持對於海陸軍的控制；再則曰：具有堅強決心，保衛國體，重建日本；三則曰：全國每一份子都應該在平等的基礎上，負責協助「天皇制」，本人誓必和全國合作，以保障政體，直到簽訂降約的前夕，八月二十八日，他對報界發表談話，仍說：

「日本的國體只有恪遵『天皇』停戰的勅書和實行同盟國家的投降條款才能够保全」。
「這還还不够表示的清清楚楚嗎？他們的投降不是為了改變日本的『天皇制』，而是為了保全日本的『天皇制』，不是為了悔禍，而是為了『復興』」。

自然，爲了欺騙同盟國家，他們不能不僞裝民主，在形式上，採取一些所謂民主的措施，例如解散法西斯組織——大日本政治會，準備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準備解散法西斯國會重新選舉等。但這都不過是一些表面文章罷了。就「給予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設，是附着嚴格的限制條件的。東久邇說得很清楚，只有在「尊重日本憲法，不超出皇聖旨的範圍」的條件下，才「承認公正的輿論，建設的言論，健全的結社」！這是什麼自由呢？還不和投降以前一樣不自由嗎？又就解散大日本政治會說，那決不是鎮壓和消滅法西斯分子

學，而是在新政黨的外衣之下，保存法西斯的舊勢力。他們不僅要偽裝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黨，而且要冒充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是嗎？據東京廣播，大日本政治會解散後，它的黨員將組織一個新政黨，而民政黨、政友會這些大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將恢復，還有在「墮落幹部」領導之下的社會法西斯政黨——社會大眾黨，將被認為無產階級的政黨而許其存在，此外所謂青年新進議員那一夥法西斯少壯分子也將組織什麼第四黨；但「非合法」的無產階級的前衛——日本共產黨却仍沒有被承認為合法，甚至「合法」的日本無產黨，這樣的江農及小資產階級的進步組織，也是被排斥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謂解散法西斯國會，重新選舉，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從而由新國會所產生的新政府也決不是日本人民的自由意願的表現。恰恰相反，這倒是日本統治階級爭取保存半軍事的，半封建的法西斯統治的大成功。假使同盟國家所要求一成立的傾向和平及負責的政府，就是這樣的政府，則真可說是在戰爭上勝利，在和平上失敗了。

二十六日的蘇聯真理報說：「假使各戰勝的強國一時相信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謊言和狡猾的陰謀，那就是對於國際安全利益的不可饒恕的輕心和可恥的健忘，日本統治階級中破綻了的冒險家所抱着的目的是什麼呢？他們企圖在一九四五年的日本領土之上，再玩弄一次一九一八年德國軍官團的那一套花樣。他們希望冒充『改造』，在報紙上，對於波茨坦會議寫幾句酷刻的恭維話，在法西斯國會開會的時候，表演一齣滑稽劇，——由官方派幾個『理論家』對於『國家復興』的必要的問題，發表一些演說，而實際上是，在逃避戰爭罪犯的責任，保全并鞏固他們的軍隊幹部和參謀本部。他們的機關更廣泛地，散布他們的『世界展望』，換句話說，他們企圖準備復仇，——這就是日本破產者現在的戰畧和戰術」。的確，日本統治階級正在準備着「復仇」。第一

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德國，仍能在二十年後，挑起第二次大戰；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失敗的日本，誰能擔保它不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呢？要阻止這一危險的發生，除非是樹立日本真正的人民的民主政權。

四、日本人民的力量和責任

摧毁舊日本，建立新日本，在目前，雖由於反法西斯同盟國家握着控制日本的權力，而應該首先担负起這個任務，但日本人民自身同時，也需要担负起這個任務，特別是樹立人民的民主政權這一建立新日本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工作，如果不是依靠日本人民自身的力量，而是完全依賴外力，則不僅這工作不易完成，而且縱使一時把民主政權樹立起來了，但這政權未必是健全的，鞏固的，像沙灘上的樓閣，時有坍台之虞。岡野進說得對：「今天日本正處在十字街頭，就是說停留在軍閥主義的反動的舊日本呢？還是成為和平的、民主的新日本呢？」換句話說：繼續大財閥及其政治家的獨裁呢？還是實施代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勤勞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政治呢？我們人民無疑地，選擇後者的道路。但實現這一目的，決非容易，必須依靠日本人民大眾自己的奮鬥及其力量才能實現」。說到這裏，我們就要問，日本人民自身是否有担负這種任務，完成這種工作的力量呢？事實答覆我們是：「有一，在日本，和在別的國家同樣，存在着摧毀法西斯統治，樹立民主政權的民主力量。有人以為在日本，根本沒什麼民主力量；甚而說，日本人民根本不曉得什麼是民主。這見解是錯誤的。誠如岡野進所批評：在同盟國內一部分人民之間，有否定或忽視又或輕蔑日本民主勢力的存在傾向。這不僅完全錯誤，而且假使這樣見解

成爲有力的見解，則爲世界將來的不幸」。不過，這種民主力量決不是所謂穩健派，或所謂「自由派」的力量，而是包括各革命階層，各革命黨派，以工人農民爲中心，特別是以工人階層爲領導力量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所謂「穩健派」或所謂「自由派」決不是真正的民主力量，毋寧是像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出版的美亞雜誌所說：「實際上，他們也支持軍閥主義」。岡野進也會批評過同盟國家一部份人士把所謂「穩健派」當作日本的民主力量的錯誤見解。他說：「這些人士不去看以日本人民大衆爲基礎的民主力量，而只看着上層，即在太平洋戰爭前，被稱爲「穩健派」或「親英美派」的一部份統治階級對他們抱着希望」。其實，「他們決不是民主主義者。他們和所謂「急進派」實在是一邱之貉。固然，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他們和「急進派」之間的矛盾，也應該利用，甚至不妨把他們中間一些比較開明的，進步的分子，吸收到人民陣線中來，但決不能把他們認爲民主力量的中心。如果日本人民大衆依靠他們來樹立民主政權，信任他們來支持民主政權，其結果，一定是會失望的。同樣，如果同盟國今後，仍抬他們出來樹立「民主政權」，支持他們所樹立的「民主政權」，也一定是會失望的。美亞雜誌說：「如果同盟國當局忽視日本工農階層中的可能民主力量，那實在是一種不幸」。這話很對。假使同盟國所扶助和支持的民主力量竟不是以工農爲中心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而是同樣「支持軍閥主義」的統治階級的一分派，則其結果，必將是一方面助長了反動勢力的氣餒，他方面，惹起了人民大衆的反對。在希臘所會排演着的悲劇，還不足以做爲前車之鑑嗎？

另一方面，我們說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是以工農爲中心的人民陣線，這并不是說，只有工農才是民主力量，而把其他階層都關在民主營壘的大門之外，也就是把一切可能爭取的民主力量都

滅，推到反民主的營壘內去，而是說，一切反法西斯的各階層各黨派都屬於這一民主力量，不過它的中心是反法西斯最力的工農罷了。如果畫了一個小圈子，把民主力量的範圍只限於工農，則必招致削弱民主力量的不幸結果。

我們所說的這種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即包括各革命階層，各革命黨派的，以工農為中心，特別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力量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是不是存在？是不是有力量？事實告訴我們，它是存在着的。認為日本人民都是法西斯軍閥可以任意支配的馴服的綿羊，是錯誤；認為日本人完全支持和擁護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更是錯誤。事實上，日本人民大眾是具有着反法西斯鬥爭的光榮的歷史的。在一九四四年九月間，我們不是在報紙上看到日本的議員、教授、新聞記者、著作家、社會聞人加藤勘十、山川均、黑田壽男、鎗木茂三郎、向坂逸郎、荒畠勝三等十九人被法西斯統治者於二十五日宣佈判處死刑嗎？他們為什麼被判處死刑呢？就是為了組織和領導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運動。我們知道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樹立運動是和日本法西斯政權的樹立運動，同時發展着的。遠在「九一八事變」以前，法西斯運動抬頭，日本的革命運動也就已經以反法西斯鬥爭，為其主要任務了。不過，當時，在反法西斯的陣營裏，還不能夠步伐齊一，共同作戰，致統一各種反法西斯力量的人民陣線，也就無從樹立。自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日人西川氏在他的著名演說中，指出：「我們受對立觀念的毒害，致一直到現在，不能為利用大眾於反戰運動而有所努力，實在是一大過失」，而號召：「隨着戰爭的威脅的深刻化，我們應該利用它，喚起社會大眾黨，一切職業組合、勞動組合、全國農民組合、水平社、佛教團體以及其他反戰思想團體，而構成反侵略反戰爭的統一戰線」後，日本的各種反法西斯力量，才積極地，以結成

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爲目標，而開始團結起來了。這團結，是以進步的工人爲中心，而包括着一切不爲法西斯統治者所欺騙，所麻醉的農民，小有產者羣，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以及有產者的個別進步分子。公開地作爲這一團結的組織者，領導者的，就是加藤勘十們這一羣人。在一九三六年，他們組織了勞農無產協議會。該會的成立宣言，曾明白宣稱它的目的：「是要成爲在日本結成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推動力，是要把在從來的號召之下所團結的工農大眾和勤勞大衆由驅制而統一和指導於一定的目標之下。」同時，加藤的開爭方針書中，更具體地指出，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構成分子，包括着：（一）社會大衆黨和支持它的勞動組合，勞農無產協議會，支持它的勞動組合，以及其他勞動團體；（二）有產者羣進步政黨即經過政友會，民主黨的分化和失掉它的動搖期，而可以預想其成立的自由主義政黨。（三）其他如思想團體，文學團體，和青年主義團體等。這就是說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範圍，不限於工農階層，而是包含着更廣泛的成分的。一九三七年四月，勞農無產協議會被解散，但加藤勘十們立刻組織了日本的無產黨，仍然建立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爲中心行動目標。誠如日本內務省同年十二月廿二日發表的文告中之所說，即該黨積極地，展開人民陣線運動，虎視眈眈，待機起來。這對於日本法西斯統治者，的確是「一大威脅」。因此近衛內閣實行全國大檢舉，把加藤勘十等人民陣線的領袖三百六十七人一齊逮捕，被株連的，有一千三百餘人。內中還有國會議員，有府市議會議員，有大學教授，有新聞記者，有著作家，有評論家，有工人，有農民，隨着，一九三八年二月，近衛內閣又逮捕了所謂人民陣線派大學教授太內兵衛，有澤廣巳等卅二人。經過不斷的野蠻而殘酷的鎮壓和摧毀，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運動，自然是遭遇着極大的阻礙和困難。但是這運動仍沒有根本被消滅。

恰相反，它倒是更加發展着。不過，由於不可能公開地，合法地存在，而轉入非合法的地下的活動罷了。一九三九年，日本檢事總長木村曾說：「由於過激分子反戰思想的宣傳，革命運動者對政府的不滿，統制經濟強化下的生活困難以及戰局長期延繩所引起的人心的弛緩，實有突發不測事變之虞，」這說明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即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力量，依然是有力地存在和活動着。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隨着戰爭的擴大和延長，特別是日寇在戰爭進行的過程中，遭遇到無限的消耗和嚴重的打擊，而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運動更加強，影響更擴大了。據一九四三年冬間，從日本俘虜營逃出的美俘說：「俘虜營管理員透露出消息，日本國內人民大眾的反法西斯與反戰運動蔓延全國，使法西斯軍閥覺得難於鎮壓」。又據岡野進說：根據他從一個華北日本憲兵身上所得到的材料，就記載着一百六十名共產和社會黨的名字。據日本憲兵的公統計說：每日總有一件反戰的事件發生，這些個別的反戰運動發展下去，原是可能匯為一個淹沒法西斯政權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運動的洪流的。特別是在德國法西斯侵略者崩潰後，日本法西斯侵略者本身已陷於四面楚歌之中，日本人民大眾不僅受着機盟轟炸和盟軍進攻的威脅，而且受着更加嚴酷的不可忍受的剝削，驅策和鎮壓，這一切，更給予了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以迅速發展的機會。固然，過分誇張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說它早已發展到足以推翻法西斯政權的強大的程度，那是不對的，事實告訴我們，日本法西斯政權還沒有被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推翻，而盟軍已迫使它投降了。但是完全抹殺這種力量，認為在推翻日本法西斯政權上，毫不會發生作用，却也是大大的錯誤。不僅如前所述，日本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力量是存在和活動着，而且它是可能不斷而迅速地發展着的，比森氏曾說：「在中日二國內，日本反法西斯黨的實際人數雖然不多，但我們要

知道在最近超級轟炸機轟炸日本本土及美國海軍步步深入日本防線之前，日本人民對於實際勝利的信心，並沒有絲毫動搖。但當同盟國的進攻力量益增強，日本的失敗已無法避免時，日人在華解放聯盟和其他類似團體的勢力必將迅速增大。假如今未來的數月中，能够得到同盟國的及時承認和援助，其參加的人數必將大增¹。這種把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的發展，認為完全依靠着同盟國進攻力的增強的外來因素，固有所偏，但在德國崩潰後的局勢下，由於上述內外的各種客觀條件和革命勢力的主觀努力，在日本投降前，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已有迅速而強大的發展，則是毫無可疑的事實。雖然這種力量沒有能够很快地推翻日本法西斯統治者，但這種力量對於促使日本法西斯侵者很快地投降也未嘗沒有起着重要作用。鹿地亘說：「日本的軍閥崩潰有內外兩個要因。而作為現實問題來觀察，這兩個要因是有着互相關係的。即由於日本人民大眾的內部的鬥爭的發展，而使軍部的戰爭條件癱瘓，這就對於同盟國的戰勝，給予了幫助；另一方面，同盟國的勝利戰爭的壓迫增大，削弱了軍部的力量，則成為日本人民大眾的解放斗争上的有力條件」，這話是對的。有些人把同盟國的力量和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對立起來，隔離起來，在日本投降前，主張日本人與大眾只應該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法西斯統治者，不必和同盟國的軍事進攻相互呼應和合作，或主張同盟國只應該依靠自己的軍事進攻，擊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必運用日本人與大眾的民主力量，在日本投降後，認為日本人民大眾在打倒日本法西斯統治者上，毫無作用，或認為同盟國在樹立日本的民主政權上，毫無作用，都是破壞同盟國和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的合作而有害於摧毀舊日本，建立新日本的工作的。須知在樹立日本的民主政權上，同盟國的力量和日本人民大眾的力量，都是不可少的。特別是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尤為樹立日本的人民政權的主

要力量和必要條件。即使是在今天主要由於同盟國的進攻，迫使日本投降的場合，如果真是完全沒有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或這一力量脆弱到完全沒有作用，而僅由同盟國軍事勝利的餘威，共同或單獨，外鎊地，製造一個「民主政權」，則這政權決不是一個真正人民的民主政權，決不能鞏固地存在下去，決不能獲得大眾的擁護，甚至必將引起同盟國和日本人民大眾之間以及同盟國相互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因此在同盟國，只應扶助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讓他們去樹立自己的人民的民主政權，而不應該越俎代庖地，違反他們的意思，而製造一個他們所不願要的政府。

現有，是已經存在和發展着的日本人民的民主政權的時候了。圖野進最近於八月二十四日號召日本一切反戰反軍部的民主勢力在下述共同綱綱上，團結起來，實為適時的，必要的號召。所謂共同綱領，是：（一）由一切反戰反軍部的勢力組織民主聯盟，以此為基礎，組織臨時政府；（二）嚴格實行波茨坦宣言；（三）嚴懲戰爭罪犯，沒收他們的財產，解散一切反民主主義團體，禁止積極支持戰爭和軍部的人們擔任政治、經濟、社會上負責的地位；（四）廢除一切惡劣化法令，立即釋放政治犯，保障言論，思想，信教，結社的自由。（五）將政權交給民主的議會，根據民主主義的原則修改憲法；（六）根絕封建的軍國主義的宣傳教育，實行民主主義思想的教育；（七）土地國有和銀行，重要企業收歸國有，國家對大資本家實行嚴格統制；（八）改善勞動者的生活，對戰爭，災民及失業者實行有效救濟。這裏所說的民主聯盟就是現階段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線；由它所建立起來的政權就是人民的民主政權。

這所謂人民的民主政權，將是怎樣的一個政權呢？它將具有怎樣的內容和形式呢？無疑地

，它只能是廣泛人民的民主主義的政權，也就是人民陣線的政權，而決不能是一個階級一個黨派專政的政權。它不僅不能是大財閥，大地主專政的法西斯政權，不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造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權，而且也不能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政權。它的內容是和人民陣線的內容同樣的，因爲人民陣線不外是沒有握得政權時的人民政權，而人民政權則不外是握得政權後的人民陣線。它的形式也和人民陣線同樣，是各革命階層，各革命黨派的聯合組織。由各革命階層，革命黨派聯合起來專政的政權，就是日本人民的民主力量所要和所能樹立的人民的民主政權。所以日本人民解放聯盟綱領草案第八項規定：「打倒戰爭政府，組織代表人民的意志和福利的各進步黨派聯合的人民政府」，而岡野進所提出的共同綱領，則要以由一切反戰反軍部的勢力所組織的民主聯盟爲基礎，而組織作爲過渡的日本人民的政權的臨時政府。現在，世界政治的潮流不僅是民主主義戰勝法西斯主義的潮流，而且是廣泛的人民的民主力量衝破了一階層一黨派統治制度的潮流，歐洲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蹂躪和支配的國家，在它們的反法西斯鬥爭的過程中所表現的新的事實，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可以相信任何國家不能成爲例外，日本自也不會成爲例外。

要樹立這種政權，不論在戰爭結束以前或在戰爭結束後，首先就必須「打倒戰爭政府」即軍閥法西斯支配下的政府。鈴木內閣應該打倒，東久邇內閣依然應該打倒。這是一種革命的鬥爭。但是所謂革命依然是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在日本，現在，還不可能，因而也不應該進行什麼社會主義革命。過去日本的托派——解黨派高嚷着社會主義革命，是爲了混亂革命陣營破壞革命運動，今天，日本軍閥法西斯還驅使着擺着革命的面孔的奸細，來賣弄這一套，以

混亂反法西斯！

楚了之

本人民大眾如果跟着喊這口號，就免

得鬥爭，還是民主主義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完全廢設資產階級；被廢除資本主義制度。自不同。它不是聯合的政一些被包持，

財閥
這東西

就是首先

是擁護「天皇」

對於這些解釋，還有

本中又作了一度更清

，應該怎樣處置呢？「天皇」

」，是以「天皇」爲首，爲中心
本。第二，作爲人們神的化身，在人民之中
而組成的，在政治上，

有兩個作用

在政治上，

一起着半宗教的作用。這兩種作用是互相結合着的，不過，也可分離。正和政權與宗教可以分離是同樣的道理。因此，我們對第一個作用所採取的態度和對第三個作用所採取的態度應該有區別」。一作為專制政治機構（「天皇制」）之首的「天皇」或「天皇」的特權，必須和這機構同時立即廢除，以實現民主制度」。「我們必須立刻廢除作為專制機構的『天皇制』，實現民主。在這點上，是沒有任何妥協的。所以我們主張日本的民主主義化，和廢除『天皇制』是同一意義的。」「但我們對『天皇』第二個作用（半宗教性的影響力），則必須採取慎重的態度。過去七十年來，在一般人民心中種下的對『天皇』的信仰是相當深刻的」。「這是日本人民的不幸，但却是事實。從這個事實出發，我們必須考慮到當前的口號」。「在我們解放聯盟的綱領中，沒有提打倒『天皇』的綱領。因為解放聯盟是一個在日本人民當前的目的——反對戰爭，打倒軍部，建設民主的日本的口號之下，動員廣大人民的團體。當然必須爭取反對戰爭，和軍部，但又不放棄崇拜『天皇』的人參加。如果我們提出打倒『天皇』的口號當然能够投入我們陣營裏來的羣衆，他將因我們提出這口號而離開我們，我們有從羣衆中孤立起來的危險。這是解放聯盟綱領中，沒有提到『天皇』問題的理由」。「但是，如果以為我們歡迎在戰後的日本，保存『天皇』，那就完全不是這回事」，我們共產黨要求建立沒有『天皇制』，沒有『天皇』的徹底的民主共和國。為實現這個目的，我們向人民大眾進行宣傳教育。不過如我們的要求違反了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便不能實現。如果大多數人民熱烈要求保存『天皇』，我們對此必須讓步，因此，對於『天皇』存廢的問題，我們主張：在戰後，由一般人民的投票來決定。投票的結果，縱令保存『天皇』，這時的『天皇』也必須是沒有專制權的『天皇』。日本法西斯侵客者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岡野進

二日，把這意見，再度聲明了一次。並指出：過去日本人民中，有人認為日本共產黨「廢除『天皇』，他們是誤會了」。岡野進們的這些解釋和說明，不僅是闡明日本共產黨的態度，而且也是正確地，指出了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權和處理「天皇」和「天皇制」的關係，就是說「天皇」應該廢除，但不一定立刻便必須打倒。認為人民政權的樹立絕對排斥「天皇」的存在，這是一種機械的看法；但認為人民政權和「天皇」可能始終並存，也是不正確的看法。今天問題的中心不在保存不保存「天皇」，而在剝奪不剝奪「天皇」的特權。也就是說，今天的問題是究竟還讓法西斯統治繼續下去呢？還是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權。如果是前者，則縱使廢止「天皇」，而像過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那樣，另來一個興登堡以至希特勒，還是要不得的。反之，如果是後者，則縱使「天皇」暫時還存在，像直到今天為止的意大利那樣，實權不在國王，却也不至發生大害。建立人民的民主政權決不是很容易的事。這需要人民作最大的努力，並需要採取適當的策略。

(五)新日本的輪廓

只要是日本的真正的人民的民主政權樹立起來了，則新日本的基礎便已奠定，在政治上，它必然是對內實行民主措施，對外反對侵略戰爭；在經濟上，它必然是發展國民經濟，同時，保障人民生活；在文化上，它必然是普及民主思想，肅清法西斯殘滓。具體地說，在政治上，它首先要把「主權在君」的反動憲法修改為主權在民的進步憲法，廢除了反動憲法上的一切反民主的規定，剝奪反動憲法給予「天皇」，軍部及其他統治階的特權；另一方面，新憲法則給予人民大眾的一切自由民主權利以絕對的保障；其次，它必須有一個由普選產生的代表各階級，各黨派的利益

和意思的真正的國會，並由這國會產生一個同樣性質的即人民戰線的政府。在經濟上，它首先必須實行土地革命，並實行農業的機械化，其次，是在日本已有的工業基礎上，發展高度的工業，以解人口問題；第三，是開拓國內市場，避免向外傾銷；最後，必須實行大企業的國營或嚴格統制，廢除一切托辣斯，加迭爾等制度，另一方面扶植中小企業的發展。在文化上，它首先必須改革封建的法西斯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內容，各級學校的教員必須從新培植，各級學校的教材，必須從新編製；其次，報紙及一切文化宣傳機關，都必須從法西斯分子手裏拿過來，交給人民大眾，對於人民大眾的文化活動，必須給以便利和扶助。這就是新日本的輪廓。也就是今後應該建立的新日本。

414

414b-

300//3/34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出版

何建立新日本

初版 五〇〇〇册

著者 張友

出版者

启星

成都陝西街六十一號

發行人

張西洛

成都文期快報

成都春熙北段

印 刷 者

启

印刷廠西糠市街二十八號
營業部春熙北路五十七號

總經售

首

成都祠堂街孝天大樓

局局社局

本叢書第一輯

永生的羅斯福

(業已售罄)

本叢書第二輯

舊金山會議內幕

(業已售罄)

本叢書第三輯

英國的民主

(每冊二百元)

如何建立新日本 (張友漁著)

每冊售國幣二百元